

清末中国学制改革的文化价值取向

杨 晓

(辽宁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9)

摘要:本文以清末中日关系易位为背景,阐述中国借鉴日本近代教育模式,建立近代学制,全面启动教育近代化的文化价值取向。中国受日本学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办学宗旨以国家主义为旨归,倡导从小学到大学的兴学路线,以军事教育与实业教育为急务。晚清中国最终运用“行政优先”的策略,在封建统治的摇摇欲坠中,从形式上完成了中国学校教育制度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性转换。

关键词:晚清教育改革;价值取向;日本学制影响

中图分类号:G529.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3)02-0058-05

甲午海战,中国败给了素为国人所轻视的日本,巨大的战争赔款和大量的土地割让,唤醒了“中国四千年之大梦”,强烈地震撼着中国人的心灵,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中国社会各阶层所受到的沉重打击与振兴中国的民族主义激情交织在一起,伴随民族工商业的兴办与维新改革,中国教育近代化加快了步伐,清末第一次大规模的兴学高潮得以形成。借鉴日本近代教育模式,建立近代学制,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全面启动就在清末中日关系的戏剧性变化中拉开了帷幕。

一 办学宗旨以国家主义为旨归

清末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全面启动,发生在中日关系易位之际,中国由先生变为了学生。1901至1911年清政府推行新政时期,举国上下都把学习的重点目标指向了日本。1904年1月,中国近代第一个颁布并实行的学制——《癸卯学制》,是以日本学制为蓝本建立的,其办学宗旨受到日本国家主义教育的影响。

1886年,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各级学校令均强调

教育目的是“适应国家的需要”。1889年1月28日,在文部省,森有礼对直辖学校校长讲:“学政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国家。譬如在帝国大学提高校务,凡涉及到学术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应以国家的利益为重,放在最前面。其他学校也是如此。在学政上应始终记住,并非只为学生个人的利益,而要为国家的利益着想。”^{[1]145}

1890年,日本颁发的《教育敕语》进一步突显国家主义的教育宗旨。其中心思想是:通过儒教伦理道德、神道的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以及近代的法制思想来培养天皇的“忠良国民”。

日本这一教育宗旨的提出与颁布,至少有以下两点深层文化方面的原因。

其一,从全盘西化到本土化。《教育敕语》是日本在努力学习西方模式,大量引进西方近代思想,经过了全方位的西方文化洗礼之后,重新以日本文化确立其教育宗旨的体现。它恢复了日本教育“政教统一”的文化传统,反映了日本教育从西方化到日本化的蜕

收稿日期:2012-08-25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中日教育关系的日本文化心理研究”(项目编号:08BZS035)、日本文部省2012年基础研究项目“从清末民初中国教育杂志看日本近代教育对中国的影响”(项目编号:24520818)的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杨晓(1953—),女,江西萍乡人,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中外教育交流史。

变。《教育敕语》颁布之后,日本教育以一般文化作为一种制度基础,通过承认政治性的文化和政治性的教育,使日本近代教育与西方近代教育区别开来。其文化特质是:政权统治依赖于执政者自身道德水平,天皇成了道德的化身,具有最高的道德价值。

其二,融合东西方思想。《教育敕语》既使传统儒教带有了近代色彩,又把欧洲近代民族国家思想纳入了“忠孝”伦理之中。美国著名日本问题研究学者W·霍尔认为《教育敕语》表现出三种因素的融合:神道的国家万能主义、儒教伦理、教育臣民为国家服务的近代态度^{[2]89}。笔者认为,不仅《教育敕语》的内容体现了东方古代思想与西方近代思想的融合,而且关于它的争论,也反映了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所具有的东西方文化既冲突又融合的特点。例如,作为提倡儒学主义代表的元田永孚,并不是拘泥于传统考据学的腐儒,而是主张建设和发展日本的实学者。而作为反对儒学主义的伊藤博文,也不是无视传统的激进者,而是主张对传统进行更新的改良者。更为戏剧性的是,起草《教育敕语》与反对《教学大旨》、起草《教育议》的竟然都是井上毅。

中国以日本近代学制为蓝本,全面启动教育近代化,正处于日本教育经过西化后的本土化时期。日本近代化这种既学习西方又保守儒学传统的特点,强化了中国人对日本教育近代化的文化认同与学习心理。中国以学习日本作为学习西方的中介,尽量避免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激烈冲突,有利于把西学置于中国的文化背景与教育语境之中,使中国人容易接受并实践,形成了清末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文化特质。

1904年1月13日,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在《重订学堂章程折》中明确指出:“至于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谙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3]78}这体现了国家主义的教育观,是《教育敕语》思想的一种中国翻版。

1906年3月25日,曾几度东游、深入考察日本教育的严修,在起草《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时写道:“东西各国政体虽有不同,然未有不崇敬国主,以为政治之本者。近世崛起之国……日本之教育所切实表章者,万世一系之皇统而已。我朝深仁厚泽,渐被历数百年,苟非狂悖不逞之徒,断无自外覆载之事。……日本之图强也,凡其国家安危所系之事,皆融会其意

于小学读本中,先入为主,少成若性,故人人有急公义洗国耻之志,视君心之休戚为全国之荣辱,视全国之荣辱即一己之祸福,所谓君民一体者也。”^{[4]565}这里所强调的与《教育敕语》中“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的思想更是如出一辙。这种思想成为清末中国第一个教育宗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根本指导思想。

由此可见,日本国家主义的教育观,直接影响到清末中国的办学宗旨。这是由外患所强化的保家卫国意识在中国教育近代化上的投射,中国从日本尊王倒幕中吸取的经验是:“忠君”就是“爱国”。但是,历史事实证明,日本“尊王倒幕”的政治道路并不适合中国。在清末的中国,“忠君”与“爱国”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离,对于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的爱国先进志士而言,忠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西太后,无疑与卖国求荣等同。因此,清末中国提出的国家主义教育宗旨,难以发挥其拯救民族于危难之中的功力。

诚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国家主义教育为主导建立的近代学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其功能。日本作为一个后发型国家,通过大量吸取外来文化来推动社会变革,这种变革是由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变革。中国以日本为模式,强调政体相同,就是强调以国家为主导自上而下的进行变革。因此,中国接受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就意味着在教育上采取“行政优先”的对策,依靠国家强力干涉教育。如果不以国家主义教育为主导,清末中国教育要完成从形式上建立资本主义教育体制是难以想象的,新政教育改革也无从开展。

二 推行小学到大学的兴学路线

建立近代学制究竟是从大学到小学,还是从小学到大学,是清末关于中国教育近代化道路的争论焦点之一。

王国维在《论平凡之教育主义》一文中提出从大学到小学的兴学路线,这是针对日本学者的论点有感而发的。他说:“彼等之言曰:‘不立小学不能立中学;不立中学不能立大学;故今日当务之急,在多立小学,而中学、大学,图之小学尽立之后,未为晚也。’(本报第三期辻君论说参照)此其言固常识之所易知,而亦苟安之政治家之所乐闻也。”^{[5]525}王国维认为强调首重小学教育是一种误区,主张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三者,当齐头并进,而不当偏废。

梁启超在《教育政策私议》中赞同日本教育家的

立场,提出从小学到大学的兴学路线。他是针对中国各地重视兴办高等教育的事实有感而发的。他说:“顷者朝廷之所诏敕,督抚之所陈奏,莫不有州县小学、府中学、省大学、京师大学之议,而小学中学至今未见设施,惟以京师大学堂之成立闻,各省大学堂之计画亦纷纷起;若循此以往,吾决其更越十年而卒无成效者也。”^{[6]160}他以留日学生志高意急,直接进入日本高等学校,但是因为普通知识不足,对许多事物都不能理解,所以不得不降低身份,先到中学去学习为经验证明,强调:“求学譬如登楼,不经初级,而欲飞升绝顶,未有不中途挫折者。”^{[6]160}他呼吁学校体系的建设应“以政府干涉之力强行小学制度始”,而经费则由本校、本镇、本区自筹。可以说,他是日本初兴学校时的举措为建立中国学制的参照。

罗振玉在撰写《日本教育大旨》一文时,提出日本教育首要的是普及国民义务教育。他与梁启超一致,主张从普通到高等的兴学路线。他说:“中国今日尤当以普通教育为主义,预定义务教育年限,先普通而后高等。”^{[3]37}他同样对各省兴学只重视高等教育提出了批评,他说:“譬如今日各省专心于高等教育,虽每省学校遽增千百所,而教育不及齐民……若从事于普及教育,则功效必溥矣。”^{[3]37}从实质上讲,是否重视国民义务教育是传统教育与近代教育的分界线。

提出从小学到大学的兴学路线,虽然受到了传统势力的阻碍,但是这条路线还是逐渐被更多的人所接受。1903年,欧阳弁元撰《北京西城私立高等小学校第二次报告章程》,宗旨为“专以改良童蒙教育养成国民能自谋生计为目的,兼预储寻常中学生徒之资格为宗旨。”自行捐资试办,不请公款,不求外助。文章说:“小学者造就国民及人格之第一义,诚学校之始基,国民之起点也。”^[7]1905年,陈清震撰《强迫义务教育》一文,从学生生计与改革社会两大方面阐述了强迫义务教育的重要,强调“初等小学堂,所以施普及教育,尤为陶铸国民之洪炉,而为国家之命脉”^[8]。杞忧从比较中国与日本小学教育入手,论证教育关系国家之强弱,强调“振刷精神,亟起而救亡。视小学校为我豫之命脉,视推广小学校为成豫命脉生活之机关”^[9]。1906年,《教育世界》杂志载文指出:1905年,山西省招收了180名学生,入学程为一年半的简易师范科学习,以两人共教一所小学推算,可办小学堂九十所;作者乐观地认为:“小学发达甚易。”^{[10]78}1909年,庄俞在《教育琐谈》一文中论述道:“本之生,自根而枝而叶,

以致成材,不可躐等也,人之于教育也亦然。自小学而中学而大学,不可躐等也。”^[11]

《癸卯学制》最终也以日本为借鉴,突出了重视小学教育的意义,主要体现于以下几方面。

其一,认清国民教育是各类教育的基础,强调学习日本重视小学教育,把各类教育的基础夯实。姚锡光在《东瀛学校举概》中说:“其(指日本——笔者注)通国之小学校中学校实培育人才之基,丕变风俗之渐……而小学中学之法循之有途,举之甚易,苟能变通,不待十年,必焕然易观,是又贵速为振作者已。”^{[12]16}张之洞也反复强调:小学教育是国民教育,不是人才教育,是国民对国家尽义务的教育;各国教育家都认为“造就人才备国家任使为第二义,其第一义则谓:知学为人民当尽之职分,使人民入学为国家当尽之职分”^{[3]68}。

其二,突出以小学教育为第一义。张之洞在《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中明确提出,“小学为急,为第一义”,“窃维义务教育创行于普,今则几遍全球”,“日本兴学之初,即先设大学校,后知其弊,于明治五年乃设预备学堂,注重小学,以普通学及英文教授渐次推广,始臻今日之盛。其筹划小学可谓不遗余力,国之强弱由于民之智愚,日本之兴,盖在于此”^{[3]68-69},中国也应照此办理。

其三,强调小学应为义务教育。“日本初创学校,尚未全明义务教育之理,故学制中未尝阐明此旨。后来知识增长悟教育一事以普及为要领,故定义务教育为寻常小学四年。义务教育者,谓教育为国家之义务,其教育方针在令全国人民悉受学,俾具普通知识与国民资格也。”^{[12]233}明确了小学教育与义务教育制度确立之间的关系。《学务纲要》在论证小学教育时说:“初等小学堂为养正始基,各国均任为国家之义务教育。东西各国政令凡小儿及就学之年而不入小学者,罪其父母,名为强迫教育。盖深知立国之本全在于此。”^{[3]82}

与此同时,在中国师范学堂任职的日本教习也成为提倡小学教育的积极宣传者。1905年,日本教习小林鹤藏在保定师范学堂开学典礼上说:“小学堂的教育为各种教育之根本,又为国家进步的根本,所以小学堂教育可以叫做国家的实在根本。”^[13]

另一位日本小学教师在中国杂志上发表《教育杂谈》,以“视死如归”作为东方美谈与西方重个人生命的观念冲突为切入点,大谈能使人人为国家含笑而死的

不是大政治家、大哲学家、大诗人、大学教授或中学教谕,而是小学老师。他说:一些为民奋斗、为国捐躯之类的教训“若在中学以上之教室听之,往往以为老生常谈,一笑置之而已。而在小学教室闻之,则直刺入小胸,忽感悟我等身虽小,而双肩所荷之责任甚大,铭于肺腑,积久不忘”^[14]。一句话,先入为主,小学是渗透国家思想最为得力的场所,也是日本国家主义教育得以普及的温床。这些日本教师对小学教育发自内心的情感,在无形中影响着当时中国学校的师范生对重视小学教育的认同。

三 富国强兵以实业与军事教育为急务

倡导实业教育以富国,在清末也形成了朝野上下的基本共识。实业家张謇访问日本时参观了日本的农业学校、纺织学校、商业学校等,得出的结论是无论为工为农为商,均应以教育为本。晚清学部《重订学堂章程折》将实业教育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加以倡导,指出:“国民生计,莫要于农工商实业,兴办实业学堂,有百益而无一弊,最宜注重。”^{[3]78}要求各省根据地区实业发展的优势条件,广设各级各类实业学堂。实业学堂从横向分为工、农、商三大系统,从纵向分为初、中、高三个阶段,与普通学校交叉递进,而限于在实业学堂系统内的逐级递进。即初等小学校毕业生可进初等实业学校,高等小学校毕业生可进中等实业学校,中学校毕业生可进高等实业学校。这就是为工为农为商,均以教育为本的涵义。

关于在学校推行军事教育,是一项有争议的工作。争议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军事教育由谁统管,张百熙认为应由兵部管,张之洞认为可由学部管;二是学校应否设立兵操一科,张百熙、张之洞从强国角度出发力主设置,瞿鸿禨从防范谋反出发反对设置。当张之洞接到瞿鸿禨的意见,要删除学堂兵操一科时,他复函从两方面加以反驳:一是以日本为样板,指出:“日本前于明治八年间初办学堂,亦只有柔软体操、器械体操,而无兵操,嗣经其文部大臣森有礼游历德国回,见德国学堂皆习兵操,恍然大悟,乃定为全国大小学堂皆习兵操之章,至今日本兵力之强,举国咸推森

有礼为首功”^{[3]73};二是以中国古代先例为证,指出:“在中国今日学堂尤为自强要端,与古人寓兵于农,管子作内政,寄军令之意相合,似不宜删除”^{[3]73}。由于张之洞的坚持,《学务纲要》规定“各堂兼习兵学”,并分别阐述了军事专科学校与军事大学的建设构想,这不能不说是借鉴了日本的强国之道。清末对于兵学的提倡不仅体现为追求一种教育精神,而且将“尚武”提升到了教育宗旨的高度,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刘师培在1904年发表的《军国民教育》一文中指出:“中国从秦汉以来,不晓得尚武,有两椿原故。一椿是说偃武修文。中国的古书都说用兵是个坏事,读书的人,听见打仗两个字就说是穷兵黩武,结果武健的精神弄得一点都没有。……各国所行的制度,也是全国皆兵的制度,这就是军国民的精神了。”^{[15]29}整篇文章论证:教育应该树立军国民精神,具体从四个方面着手:国家思想、普通学问、名誉心、强力。认为文愚武弱是中国的最大弊端,如果中国能光复汉朝时代的军国民风尚,就与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差不多了。以日本教育为模式,纠正中国传统教育重文轻武的倾向,这是民族危机提出的一种教育诉求,在《癸卯学制》中需要得到体现。而当时的中国文人能接受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是以列强入侵为历史背景,而以武士道渊源于孔孟思想为文化基础,他们认为五伦关系与君子“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为仁之道是武士道精神的实质,是中国儒学思想的一种延伸。

通过以上三方面的具体分析可知,日本学制为制定《癸卯学制》提供了重要资源,中国近代学制是在吸取这种资源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事物的发展决定于它对具体环境的功能。提倡国家主义教育思想、推行普及义务教育、重视实业与军事教育,对20世纪之交的日本意味着海外扩张和侵略战争,对中国则意味着恢复丧失的国权,反对外来侵略。

参考文献:

- [1](日)堀松武一.日本近代教育史:明治の国家と教育[M].東京:理想社,1959.
- [2](美)Hall J. W.日本の歴史:古代から現代まで[M].東京:講談社,1970.
- [3]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G].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 [4]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G].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 [5]陈景磐,陈学恂.清代后期教育论著选:下册[G].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 [6]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G].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 [7]欧阳弁元.北京西城私立高等小学校第二次报告章程[J].华北译著编,1903,(30).
- [8]陈清震.强迫义务教育[J].直隶教育杂志,1905,(8).
- [9]杞忧.豫省急宜推广小学校[J].豫报,1905,(7).
- [10]山西教育调查总说[J].教育世界,1906,(142).
- [11]庄俞.教育琐谈[J].教育杂志,1909,(3).
- [12]吕顺长.晚清中国人考察日本记集成:教育考察记(上册)[G].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 [13](日)小林鹤藏.保定初级师范学堂开学演说[J].直隶教育杂志,1904,(2).
- [14](日)沼波濂音.教育杂谈[J].直隶教育杂志,1905,(3).
- [15]光汉.军国民教育[N].中国白话报,1904-03-15(教育).

On the Cultural Value Orientation of China's Reform in Educational System in Late Qing Dynasty

YANG Xiao

(College of Education,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029,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late Qing Dynasty when Sino-Japanese trade relationship inverted a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this thesis elaborates the foundation of China's modern Educational system following the model of modern Japanese education and the full spread of cultural value orientation of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The influence of Japan's educational system on China is mainly reflected in nation-oriented school mission, school running system from the primary school to the university, and emphasis on military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 the strategy of administrative priority, the educational system of China finally transferred from the traditional to the moder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nding of feudal system.

Key words: educational reform in late Qing dynasty; value orientation; the influence of Japanese educational system on China

[责任编辑:罗银科]